

《中国经济靠什么赢》连载四

周倩

中国的工业化投入其实从未中断过,即使在 1895 年至 1937 年间,国内经历了那么多次动乱和分裂,铁路仍越修越长,工厂仍越建越多,但是,与日本的技术差距反而越拉越大。晚清和民国官员已经不再盲目排外,但他们接受的“洋才”都是技术层面的,认识不到西方强盛的精神本源。李鸿章、袁世凯、蒋介石培养的西学人才,要么是军事人才,要么是翻译人才,要么是工程技术人才,没有学习西方哲学、文史等社会学科的心境。台湾学者柏杨对此时的中国好有一比:一个被晚期癌症击败的老拳师,在观察强大对手的优点时,不归功于对手的强壮如牛,反而归功于对手有一副漂亮的拳击手套,认为自己只要也有这么一副漂亮手套,就可发生同等威力。

工业帝国的光 and 影

日本也和中国一样“师夷长技”,但是,日本真正学到了西方强盛的精神本源。明治维新期间,日本政府派出一个级别很高的外交使团赴欧洲考察。

在大英帝国,日本使团看到的是“工业帝国的光 and 影”,英国的强大建立在英国作为“世界工厂”的基础上,而“世界工厂”的含义就是进口廉价原材料,出口工业制成品,赚取差价。即使如此,英国社会贫富差距严重,普通工人生活很差,社会治安恶化,日本使团还被金融诈骗犯骗了 25000 英镑。

到了德国,“铁血首相”俾斯麦向日本人传授追赶西洋大国的秘诀:“大国只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遵守国际法,一旦发现自己的利益受损,就会立即付诸军事行动。在这样的国际社会中,小国要维护主权,一定要依靠军事力量,因为只有各国力量对等,主权才是神圣的。”

令日本使团感慨最深的是小国比利时,当时比利时为了换取国家独立,国民上下一心搞生产,生产什么呢? 蕾丝制品和精美的玻璃制品。两种主打出口产品,为比利时赚取硬通货,用于赎买国家主权,也用这种方法积累用于工业化的资金。“这就是和平中的战争啊!”,“小国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的秘诀,就是自主精神。”明治天皇是铁腕治国,在强势推进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,政治学德国,精神学比利时,工业学英国。

工业化从来就是一个漫长、痛苦而复杂的积累过程,最主要的是,这个积累过程还很昂贵。日本最早开始炼铁、造船、开矿的藩侯,都为筹钱而绞尽脑汁。日本政府力求“殖产兴业,富国强兵”,但长期苦于财力不济。明治元年,日本财政收入 360 万,支出 3000 万,之后财政就没有过好。

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,主要从两方面下手:

一、坚决禁止外国资本介入日本的经济改革,鼎力扶持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三井、三菱、住友三大财阀。“财阀”拥有完整或近乎完整的产业链,既是产业巨头又是金融寡头,掌控着很大一部分国家权力,自命为国家政治的一部分。日本极端的民族主义即武士道精神,在工业和金融领域也很令人敬畏。

1863 年至 1868 年间,最早登陆日本的六大外资银行共有资本金两亿两(白银),这个实力,日本银行业在未来几十年里都是望尘莫及的。可是到 20 世纪初,六大外资银行除了英国汇丰,已全部倒闭或退出日本。在日本的外资银行,外资企业根本没法开展业务,本地人完全不予配合。三菱家族曾公开向所有员工发誓:“必将外国轮船公司从日本的航运市场中赶尽杀绝。”有政府和金融界支持,三菱实现了誓言。

二、建工厂、修铁路、开发矿山都要筹钱,钱从哪来? 只能在国内刮骨熬油。

日本的工业化原始积累,主要由三大财阀主导,日本当时没有海外殖民地,资本和资源极度稀缺,工业化的成本压力只能由社会中下层民众承载。

农民缴纳比幕府时代还要高昂的税金,又必须以极低的价格向财阀企业出售农作物。被扫地出门的武士们更是一贫如洗,从零起步。为此,日本国内爆发过无数次农民暴动,以及多次大规模的武士集团抗争,都被无情地镇压下去。

战前蔓延的经济危机,已使日本民众的生活窘迫不已。日本即使赢得了甲午战争,向中国攫取战争赔款 23 亿两白银,日本底层民众也未能获益。巨额的战争赔款被日本政府投向了哪里? 海军和教育。

日本海军(军工)实力的迅速膨胀,“教育立国”国策的全面实行,皆因 1895 年的那笔战争红利,而得到足够的财力支持。此后,日本大力发展理工专业,系统地加强数理化、工程学,加大投资,以建立支撑国家工业崛起的庞大人才储备。

3. 没有重工业,注定要挨打

民国前期,国人的危机意识,庞大的本土市场,推动了民族工业的逐步崛起。

工业化是大国崛起的唯一路径。大道无形,工业化必须以工业精神作为支撑。有钱能引进技术和产业,但资本、技术未必能催生工业精神和工业文明。

没有苦力,中国对世界影响就变零

在民国的“民间自主企业时代”,中国货的竞争力突然迸发出来,主要靠什么? 廉价劳

动力。

那个时代的中国劳力,廉价程度甚至不能用钱来衡量。

当年日本极具影响力的政论家德富苏峰,提出过如下论断:

“那些在树下弯着背、把脚踏在石头上的人兽难辨的苦力们,是使中国恒久屹立在世界上的真实原因。”

“中国最便宜的是人命。他们任何时候都能拿物品和人命进行交换,廉价对待人命使中国能在世界上形成一个可怕的势力。”

“没有苦力,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将变成零。”

中国劳工的超强“竞争力”很受企业主青睐,连日本政府也对中国劳工“情有独钟”。

一战时,北洋政府在日本的怂恿下加入交战一方协约国,等于中国也是参战国。作为参战国,中国军人并没有出现在一战战场上,出现在战场上的主要是中国劳工。这是为何? 疲于应付内战的中国军阀哪有多余的军力管外面的世界,怎么办? 好在日本也没看上中国军队,并不需要中国出兵支援日军,他们看上的是中国独特的人群:劳工。

一战期间,中国政府向欧洲战场派出了十几万劳工。而日本在一战的作为,主要是在中国战场对德作战,参战人数 23000 人,整场战争中日本阵亡人数最少,仅 300 人,但攫取的利益与英法不相上下,可谓远东最大赢家。而中国劳工在欧洲战场上漫山遍野,中国在一战中阵亡了 5000 人,但未能分享任何胜利果实。

商人没有祖国

直到 1949 年,中国工业产值 90%以上源于轻工业。斯大林在世时,曾一针见血指出:没有重工业,我们就不会有一切现代化国防武器,没有这些武器,就不能保持国家独立,我们就会变成外敌动武的对象。那时,我们的地位就会和现在中国所处的地位相似: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,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,只要谁高兴,谁就可以蹂躏它。

中国商人很会做生意,很多大商人与外资洋行合作赚快钱,其中财力雄厚的江浙财阀甚至做政治生意即为蒋介石筹集军费。但中国商人再有钱,也几乎不会考虑投资重工业。和国防有关的航空、造船、化学、钢铁等重工业,需要持续投入巨资,而且长期看不到经济回报,中国商人根本不会感兴趣。国民党时代的海军投资还比不上晚清,30 年代国民党军的炮兵实力甚至比不上北洋军。

以末置财,以本守之

在某著名话剧剧中,一位高大商人在决定如何处置收来的地租时,首先排除的选项,就是把钱投资在工业上。他认为土地最保险,地价肯定是不断上涨的,不可能有跌的时候。工厂万一经营不下去了,只有折价卖掉厂房和设备,可能本本钱都收不回来。最好买地收租,收了租再买地,长此下去,就能平穩地做大家业。

以末置财,以本守之。国人浓厚的土地情结,限制了资本向工业领域的流动。至今,国人仍热衷于收租经济。

一旦爆发战争和饥荒,工厂机械设备还可装船运走,到大后方,租几间房又能干起来,但是土地没法背着跑。

4. 工业文明失落的“黄金十年”

1928 年至 1937 年间,被称为“民国黄金十年”。从统计数据上看,这期间国民政府的工业成就十分耀眼,兴建了很多农田水利设施,开发了很多矿业资源,修建铁路 2 万多公里,公路增开 8 万多公里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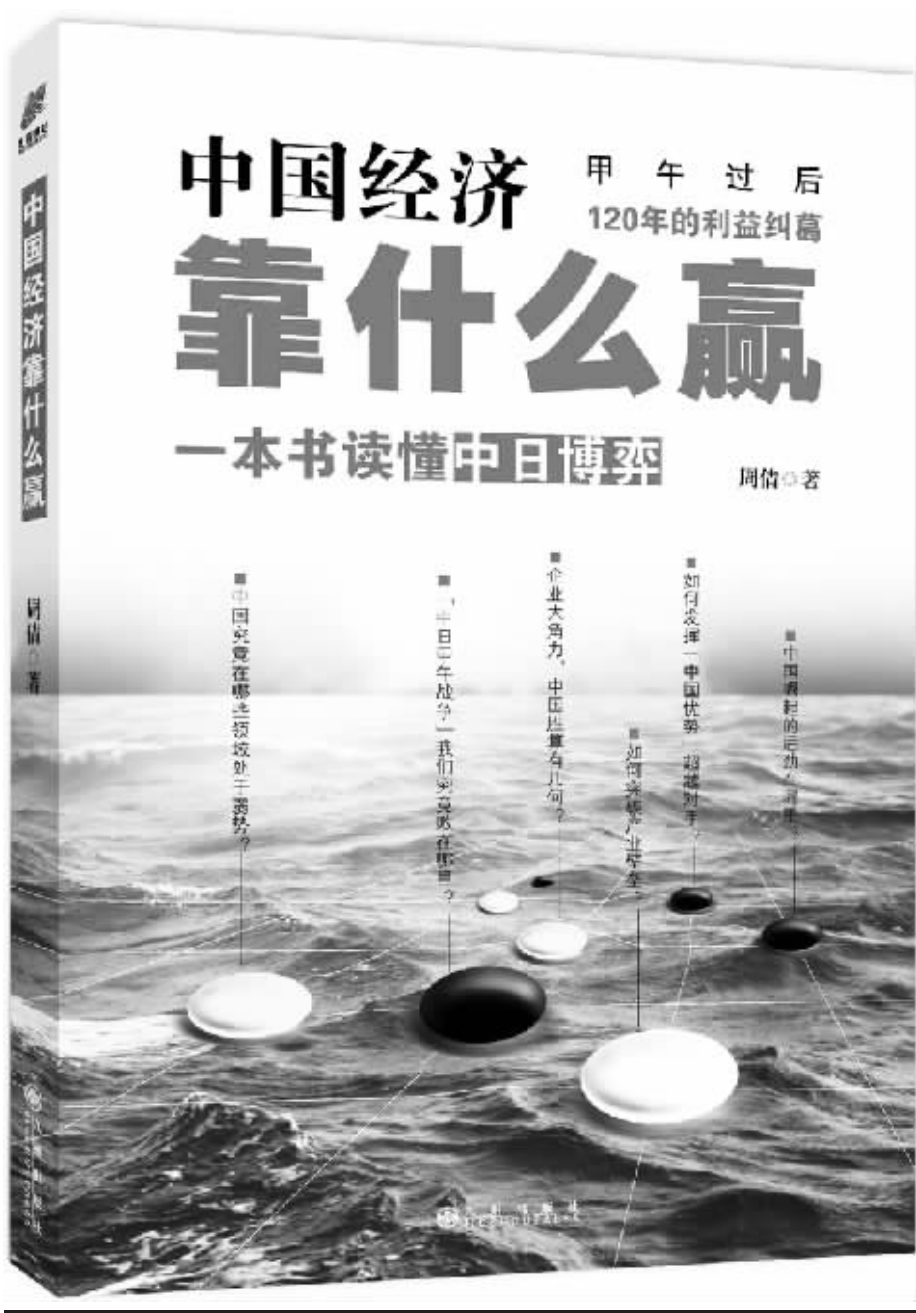
宏观数据往往会造成一些繁荣假象。判断国家实力的强弱,要看一些具体的东西。比如钢铁工业,民国政府一直倾向于从国外进口钢铁,因为经手人可以从中间吃回扣,中国钢铁工业出现了严重倒退。北洋军阀时期能造炮筒、枪管钢,“民国黄金十年”反而全不能造了。

1928 年之前的 16 年里,中国正在缩短与欧美国家的技术差距,中国第一架飞机(1912 年)、中国第一家车床制造厂(1915 年)、中国第一台万能铣床(1918 年)、中国第一台重型柴油机(1924 年)……皆出自民间企业。到蒋记民国的“黄金十年”,中国反而没什么科技成就了。为什么会这样?

1928 年,蒋介石基本上完成了名义上的江山一统,当然是以孙中山和国民革命的名义。蒋介石在 1947 年以前一直是“党总裁”而非国家元首。他很小心,总理这个名义已经是孙中山了,他不能叫;总统还没经过选举当然也不能叫,只能叫总裁。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裁,先有军权,后有党权,再有权政。

1928 年至 1940 年间,民国进入“统制经济时代”,党国体制的一大核心内容就是“经济管控”。统制经济的操作系统即国家资源委员会,当时广受热捧。从比利时留学归来的读书人翁文灏,从德国和苏联学来“用行政力量主导国民经济的制度”,坚信“苏德模式”能避免市场的竞争消耗,实现最快的发展速度。统制经济不限于单纯的经济范畴,更是政治角力,党国中央与地方实力派的角力。

1931 年 11 月,蒋介石与上海各界名流的一张合影,上面有很多银行家,如张公权、陈光甫等人,还有虞洽卿、刘鸿生、穆藕初、王云五、史量才、黄炎培……这些名流多属于“江浙财阀”,他们支配着上海的商业和银行业,控制了绝大多数的上海钱庄、织布厂和纺纱



作者简介

周倩,知名财经作家,私募人士。对产业经济学有独特研究,陆续发表产经评论近百万字。曾为多家职业机构做过投资和企业分析,为大户资金的运作做过操盘策划,有独特的资本经营能力。被誉为“难得的视野极为宽广的财经观察家”。

已出版有《财务总监》《投资总监》《操盘》《操纵》《颠覆:商业模式的危机与新生》等多部财经著作。

作者简介

厂,以及主要的船运公司和大多数开设在上海的煤矿商号。站在第一排正中间的不是蒋介石,而是史量才。这绝非偶然,在掌权者那里,从属偶然。权力体制之外的社会精英与政权之间是相互制衡的关系,而非依附关系。史量才正因为不依附于国民党政府,才被军统暗杀在杭州到上海的路上,那条路恰恰是史量才出钱修的。

这是民国时代非常阴暗和残酷的一面,工业界、金融界弥漫着不寻常的压抑感。

在蒋介石看来,没有硬硬的中央集权,就不能扫平“内乱”,应对外部(日本)的战争威胁。

苏联和德国搞经济集权,是要集中力量提升本国的“极端制造”能力,超级战列舰、重型轰炸机、大型航空母舰等“极端装备”需要何等的国力才能造出来。

国民党推行的国家资本主义,则是抑制了民间资本的自主发展,而民营企业往往是基础技术的创新主体(至今如此)。

1937 年前后,日本的技术实力仍落后西方 10 年以上,但相比中国,则要领先一个时代。

国民党政府在军重工业技术的研发上,根本没多少投入。国民党海军连一艘战列舰都没有,实力甚至远不如当年的北洋水师;国民党陆军几乎没什么远程火力,与日军交火,经常是日本兵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,整团整师的部队就拼光了;国民党空军一开战就面临全军覆没。

苏联黄金十年几乎与民国“黄金十年”同期,与蒋介石相比,斯大林所接手的摊子并不算优越。

苏联的工业崛起

20 世纪 20 年代初,美国石油巨头阿曼德·哈默开始了在苏联的石棉矿承包冒险。哈默完全不能想象俄国的工业技术和设备落后到什么程度,他说:“我一生中还没有见过用这样陈旧的办法来采矿的。工人们用笨拙的手,钻开凿矿石,通常需要三天才能钻出一个足以安放炸药的洞来。炸碎的矿石是装在筐里,用人背上高处台阶的,在那里工人们坐成一排一排的,用小锤将石头敲碎。矿石经过清洗后,就由农民用小车把它们运到 10 里外的火车站。”原始的手工开矿,代表了当时苏联普遍的水平。

哈默不得不为这个石棉矿项目做一些计划外的投资。他首先是引进设备,从美国带来发电机、气动钻,用捣碎机取代小榔头,用电锯取代传统的木锯,几分钟就完成从前一整天才能完成的“伐树碎石”工作。哈默还引进了 50 台福特公司生产的拖拉机,同时,找来福特公司的工程师对俄国人进行培训,教他们如何使用拖拉机来抽水、锯木和耕地。

工业基础如此薄弱,是很难在强国林立的欧洲立足的。

斯大林是个强硬的民族主义者,深知大国崛起的途径一定是工业崛起。当年苏联面临的国际形势也是错综复杂,敌友难辨,外部的战争威胁始终难以消除。斯大林急切地追求国家工业化,提出“苏联必须在 10 年内赶超西方工业强国”。有大量德国专家的技术支持,苏联的工业崛起进展得很顺利。

因为一些政治因素,苏联当时正被西方冷落,德国也遭到英法等国的敌视,两国算是惺惺相惜。德国作为一战战败国,军重工业的发展受到严格限制,但德国可以通过“技术援助”苏联,躲过英法等国的监视。德国专家得以在苏联工厂中测试各种新的技术和发明,维持德国工业技术(尤其是军工技术)的世界领先水平。

1922 年至 1927 年间,大批德国专家被派往苏联,手把手帮助苏联工程师们建立起飞机、坦克、大口径火炮、化学制品等一系列制造工厂。随着这些工厂的建成投产,苏联获得了极为宝贵的先进工业技术扩散的机遇,培养了一大批军重工业的工程师,同时学到了德国工业精细化的生产管理技能,大大缩短了苏联与工业化国家的技术差距。

中国仍未完成备战

1933 年至 1938 年间,蒋介石积极与纳粹德国展开交往,希特勒因为要“确保从中国获得稳定的战略资源”,迫不及待地希望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合作。

在中德关系的蜜月期,中德之间的战略物资和军火贸易发展迅猛。1934 年至 1938 年间,德国从中国进口的钨砂(制造枪炮等必不可少的战略原料)分别为 2510 吨、4784 吨、5091 吨、8037 吨和 8962 吨,从中国钨砂占德国进口钨砂的比例来看,1934 年占 57.2%,到 1937 年已达 70.6%。除了钨砂,德国还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的锡、锡等重金属原料。在德国重整军备的过程中,从中国获得的战略原料起了很大作用。那么,中国能从德国获得什么?

1936 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前夕,德国对华军火出口金额达 6405 万马克,占德国军火出口总额的 28.8%,中国成为德国军火的最大买主。当时,国民党当局已有一支 8 万多人全部德式装备的精锐部队。但是国民党政府未来得及借助德国技术,建立自己的重工业基础。1935 年,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主持制订了重工业发展的三年计划,确定中德合作进行的 10 大工业项目,有钢铁厂、钢铁厂、炼铜厂、炼油厂、中央机器厂(包括电机厂、机床厂)、中央电工厂(包括电线厂、电话厂、电子管厂)等,德国方面除提供设备外,还负责工厂的设计、主要厂房的建筑和设备安装。

日军侵华彻底扰乱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,导致中国未能积蓄足够的迎战实力。

1931 年,日军轻易攻占东北三省,憋到 1937 年,抗日战争才全面爆发。八年抗战,打得好艰苦!日本是同时进犯东南亚,加上打俄国、防苏联,硬是战了八年,最后因为挨了原子弹才罢手。可见,当时中日两国的军事和工业实力有多大差距。

可是,从 1895 年甲午战争结束,到 1937 年“七七事变”开始,天敌日本已经给了中国足够的“备战”时间。这 42 年间,日本在发展,中国也没有停滞不前。“中华民国”并没有像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一样迅速崛起。要知道,日本明治维新只用了 9 年时间,就完成脱胎换骨,再也没人敢欺负他们,只有他们欺负别人。而中国从辛亥革命算起,到 1937 年,哪怕其间经历了“黄金十年”,还是没出现质的腾飞,终于招来日本对中国发动的全面战争。

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,一手举起“同文同种”,一手举起“大东亚共荣圈”,这两块政治招牌其实在显示日本对本国工业文明的优越感。

没有技术的民族的末日

工业精神受到压抑,加剧“中华民国”的国力衰颓。而同期的日本,财阀企业也没有多少技术创新。

美国与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互为敌国,但对于战争结果,双方的观点高度一致:日本能源不安全甚至战败,主要原因是“技术失败”。

1945 年临近二战结束,美国本土已经具备每小时生产一架轰炸机的工业能力。此时,象征日本海军荣耀的 65000 吨“大和”号战列舰只能用酒精充当作动力燃料。

美国《生活》杂志刊登了一张被炸成废墟的日本东京的照片,下面写着这么一行字“没有技术的民族的末日”。

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,日本军重工业在巨额军费的刺激下得到迅速发展,日本军舰、军机的技术水平迅速追上甚至超过欧美。比如日本的“零式战斗机”,无论在续航距离、最高速度、还是上升性能、盘旋能力等方面都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。

但是,为何日本最终在技术上败给了美国?

美国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发展了汽车、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的制造工业,民间企业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积极开展技术革新,重视质量管理,通过发展强大的民生工业体系夺得全面的科技优势。

太平洋战争带给日本的最大教训是:一国的军事实力不只源于军重工业,民用工业也能发挥重要作用。美日交战之初,日本海军的技术水准甚至领先于美军,但美国以其全面的技术优势为后盾,通过实施科技资源从民用向军用的战略转移,武器规模、性能优势迅速在实战中显现。

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,不遗余力地进行技术追赶,尤其是 20 世纪前 20 年,日本采取对英美协调的外交政策,为技术引进创造氛围。在此背景下,英美等国企业纷纷对日本进行直接投资,比如美国通用电气与东芝、西屋与三菱电机、标准电气与住友电工等双双成立合资企业。大量高价值技术逐渐在日本工业领域扩散,日本国力得以快速提升。但是,军部独裁改变了这一势头。

日本军部势力“不顾自己国内原料的贫乏,竟在世界跋扈”,导致日本与西方国家的蜜月期结束,技术引进随之中断,本已缩小的日美技术差距又开始拉大。

财阀企业曾是推动日本技术革新的主力,此时受政治氛围影响,更倾向通过“公关手段”讨好军部,争到利润可观的武器订单,“只要是军事需要,花多少钱都没关系”。不像德国军方急切地追求“革命性军事技术”,日本军人更强调“武士道精神”,也使财阀企业完全没有技术创新的冲动,只知道一味追求数量指标。

号称“皇军之花”的日本关东军,无视科技进步带来的军事思想和战术上的变化,他们仍坚持精神制胜的“非凡想法”——敌人的数量要靠我们的训练来抵消,敌人的钢铁要靠我们的肉体去碰撞。

第三章:中国工业,如何在世界格局中绝地反击

1. 鏖战中的工业化雄心

技不如人、国力衰竭导致中国上百年来遭受外强欺辱的历史,由此产生的那种不寻常的历史冤屈感,成为中国迅速崛起的一大精神动力。

中国的工业崛起是被逼出来的

1949 年建国之初,中央政府就面临一场从民国延续下来的长期经济危机。国内粮食减产 150 亿斤以上,农村有 4000 万灾民嗷嗷待哺;全国失业的工人、知识分子约有 150 万人,半失业人口更多;内战还没有彻底结束,政府必须多印 2 倍以上的钞票来支付 450 万军队和 150 万国家机关(及企业职工)的费用;物资短缺,通货膨胀,国库的黄金储备全被国民党运往台湾,要稳定国内的财政金融更是难上加难。

党政高层本想尽量争取和平时间,专注于缓解国内的危局。不料,朝鲜战争爆发,旷日持久的高强度战争,迫使中国快速充实工业实力。

(待续)